

# 劃破文革夜空的思想星火 ——評《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 唐少杰

印紅標是中國大陸著名的文革研究學者之一，幾十年來，他所做出的細緻、扎實而深入的甚至是帶有開創性意義的研究工作早已蜚聲海內外。《足跡》這本專門評述文革青年思潮的著作是文革研究領域的一項重要成果。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印紅標是中國大陸著名的文革研究學者之一，在文革結束前後之際就開始了對文革思潮的特別關注和廣泛探索。幾十年來，他所做出

的細緻、扎實而深入的甚至是帶有開創性意義的研究工作早已蜚聲海內外。若干年前，筆者就曾經多次催促紅標兄及早出版他本人的研究著作，而他則是鐵杵磨針般的執著和認真，不斷加以打磨、雕琢，終於在2009年這個年頭不平凡的春天，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在其博士論文基礎上改寫的、近五十萬字的力作《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以下簡稱《足跡》，引用只註頁碼）。在筆者看來，這本專門評述文革青年思潮的著作是文革研究領域的一項重要成果。

—

《足跡》一書有如下優點：第一，這是迄今為止對於文革歷史（不是西方文革研究界所認為的1966至1968年的「三年歷史」，而是中國大陸一般認為的1966至1976年

的「十年歷史」) 中青年思潮的最為詳盡的展現；在某種意義上，該書也是對於文革期間的「異端思潮」(相對於文革意識形態而言) 的一個比較透徹的把握。據筆者所知，在西方學者的文革研究中，還沒有關於文革中「青年思潮」或「異端思潮」的專著。香港田園書屋1997年曾出版了宋永毅、孫大進編著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這部著作雖然帶有開創性，但它主要還是一部半為匯集文革異端思潮文獻、半為評價性的編集性著作，它所涉及的文革異端思潮約近十種。相比之下，《足跡》比起先前人們所做的工作更加詳細、具體和深切，它所涉及的文革青年思潮約有數十種。無論是在對文革青年思潮的評價上，還是在對文革青年思潮與文革歷史之關係的把握上，《足跡》都達到了新的水平。

第二，《足跡》對於文革整個時期的青年思潮的定性不僅準確如實，而且對於總體意義上的文革青年思潮的走向和流變的把握也細緻入微。作者對文革青年思潮的梳理不僅十分到位，而且處處平實而又經得起推敲的概括和評述十分值得回味。在該書的許多地方，作者「慢工出細活」的學力或曰「厚積而薄發」的學識，頗為新穎、清晰。作者把文革時期的青年思潮劃分為文革伊始的「老紅衛兵思潮和保守派思潮」、文革初期的「造反派紅衛兵思潮和極左『新思潮』」、文革不同階段的「非主流思潮」、文革中期的「知識青年思想探索」和「『批林批孔』前後的青年思潮」、文革後期的「四五運動時期的青年思潮」等，既

表明了文革青年思潮發展的大致歷程，又凸顯出了文革青年思潮的大致趨向。

作者十分準確地指出，「血統論」「是老紅衛兵事實上的組織原則，是剖析老紅衛兵社會基礎和解讀老紅衛兵思潮的關鍵」(頁12)。「『二十年後的世界是我們幹部子弟的！』……這種社會現實正是一種社會痼疾」(頁17)，也是文革青年思潮泛起的一個頗為怪誕的濫觴。作者深刻地分析了這種充滿了「血統論」的老紅衛兵思潮之所以被文革發動者和最高領導者利用，就在於「毛澤東看中的是紅衛兵與工作組的對抗，是紅衛兵這種擺脫工作組領導開展群眾運動的組織形式」(頁21)。而只是到了文革進一步的深入和嚴重衝擊到老紅衛兵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之後，在老紅衛兵中才產生了對於文革的最早的，也是最具異化特色的懷疑心理(頁31-33)。老紅衛兵思潮轉化為文革最初的保守派思潮完全合乎文革的歷史邏輯。

儘管總體性的紅衛兵思潮包括老紅衛兵、保守派紅衛兵和造反派紅衛兵思潮，但是，相比較於老紅衛兵思潮，只有造反派紅衛兵思潮才在某種意義上體現出了初期文革群眾性思潮的真諦，原因之一就是「造反派學生的政治和思想特點是二者的結合：一方面擁護共產黨，對毛澤東懷着崇拜之情；另一方面則在思想和行動上不再無條件地相信和服從黨的各級組織和領導幹部，……反對『奴隸主義』」(頁60-61)。由此，作者細緻地展示和分析了文革最具代表性的造反派紅衛

《足跡》比起先前人們所做的工作更加詳細、具體和深切，它所涉及的文革青年思潮約有數十種。無論是在對文革青年思潮的評價上，還是在對文革青年思潮與文革歷史之關係的把握上，《足跡》都達到了新的水平。

文革中最有價值和最  
具前瞻性的思潮是作  
者所稱的「非主流思  
潮」。這樣的思潮雖  
然在當時勢單力薄甚  
至孤掌難鳴，但是在  
文革思潮史乃至整個  
中國思想史上都產生  
了持久的影響。

兵思潮以及極左「新思潮」，準確地  
界定和凸顯了造反派紅衛兵思潮的  
宗旨、內涵和取向(頁58-74)，頗具  
匠心地比較了同樣是作為造反派的  
中學生與大學生在這一思潮問題上  
的異同。作者還以清華大學造反派  
紅衛兵的演變為基點，很有說服力  
地證明了造反派內部的「溫和造反  
派」與「激進造反派」的爭論和衝突，  
比起它們各自與任何其他造反派紅  
衛兵思潮的分歧和鬥爭都更加深刻、  
激烈和沉重(頁75-84)。

從造反派思潮發展出來的、被  
稱之為文革「極左『新思潮』」，既是  
文革造反派思潮的某種思想歸宿，  
也是導致了「原來被視為『右』的學  
生被引導去反對黨內『右』的『修正  
主義』，朱學勤稱其為『右腳踩了右  
手』」(頁185)這種文革青年思潮的  
獨特「景觀」，更可以看成文革所有  
造反派思潮的極致。儘管文革中這  
類形形色色的極左「新思潮」約有  
十個之多，但是它們幾乎無不是源  
於文革「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而  
走向動搖或削弱文革意識形態的文  
革異端思潮。

然而，文革中最有價值和最具  
前瞻性的思潮不是上述曾曇花一現  
的思潮，而是作者所稱的「非主流  
思潮」。這樣的思潮雖然在當時勢  
單力薄甚至孤掌難鳴，但是在文革  
思潮史乃至整個中國思想史上都產  
生了持久的影響，展現了不朽的魅  
力。作者舉出並且分析了以王容芬、  
遇羅克、王申酉、王正志、吳曉飛  
為代表的非主流思潮的主張和特性，  
別開生面地把這些非主流思潮的  
價值訴求和精神取向同整個紅衛兵  
思潮的主張及其轉向作了相當

貼切的比較分析。可以說，《足跡》  
不僅着眼於那些文革時期的青年主  
流思潮，還較為全面地概括了非主  
流思潮；不是只重視文革結束後或  
者今天人們所格外關注的異端思  
潮，而是盡可能地涵蓋和動態性地  
評述文革時期所有的青年思潮，諸  
如「非異端思潮」(如文革伊始的老  
紅衛兵思潮)、「準異端思潮」(如文  
革第二年的老紅衛兵思潮)等等。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足跡》就是  
一部較為完整的文革青年思潮史。

第三，《足跡》較為全面、客觀  
地概括了文革青年思潮的各個主要  
流派、主要思想脈絡及其各自的主  
要方面。例如，作者對於文革中期  
的青年思潮分析主要以「知識青年  
思想探索」為基點，總結出這種思  
想的四個脈絡，一類由「針砭時  
弊、反思文革」到「對政策和經濟體  
制的批判性思考」，另一類由「對社  
會制度的批判性思考」到「關於階級  
鬥爭、民主和自由的思考」；而由這  
四種脈絡帶來了整個文革時期知  
識青年思想的彌足珍貴的兩大趨勢，  
即作者所揭示的「時政和政策批判  
派」與「社會和制度批判派」，特別  
是對它們各自的內涵、取向、來源  
和意義，以及它們各自與文革時期  
毛澤東文革策略的矛盾和紕漏、與  
中共黨內上層鬥爭的關係的闡釋，  
別有洞天，富有新意。《足跡》還  
頗有見地地把林彪事件所帶來的  
〈「571工程」紀要〉列入「另類時政  
和政策批判」，稱其為「與一般青年  
立場迥異的另類政治思想資料」(頁  
348)。《足跡》在最後部分清晰地總  
結了文革期間的青年思潮所具有的  
特定指向：政策批判與制度批判。

第四，《足跡》可以看成是對文革民間思想或草根階層的思想歷程的一個較為詳細、具體和深入的、在某種意義上是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再現」。說它是「歷史的」，是因為作者使這種「歷史的」不是囿於純粹客觀的或外在的歷史，而是把文革青年思潮的發生、發展過程當成一種特定的文革認識史或文革思想史；說它是「邏輯的」，是因為從作者在全書對於文革眾多青年思潮所持的立場、視角和所運用的方法不難看出，文革青年思潮從文革初期充滿文草原教旨主義氣息的「血統論」、「造反論」、「極左『新思潮』」等，到文革中後期充滿懷疑主義和反思精神特色的種種「批判論」，尤其是以「李一哲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論」和其他「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探索」為代表的否定文革的傾向，乃是文革青年思潮總體趨勢的必然！

最後，《足跡》既可看作一部關於文革的大型的「思潮史」，也可看作一部關於文革的小型「思想史」。說它是「思潮史」，正如作者在本書結語中把整個文革青年思潮概括為「時政和政策批判派」、「社會和制度批判派」、「自由主義流派」、「正統派」這四大思潮，實際上，這四種思潮基本上折射或映現出了文革思潮史的主要蘊涵和主要「經絡」。在全書中，作者基於紅衛兵思潮的「光譜」及坐標轉換，着重把握了諸多紅衛兵思潮對文革的不同解讀、這些思潮與晚年毛澤東的互動、紅衛兵思潮具有的民粹主義傾向、紅衛兵思潮的社會政治根源

這四個方面，給廣大讀者展示了一幅經緯相交、立體多面、宏觀突出、微觀顯著的文革紅衛兵思潮及其嬗變的畫卷。

說它是「思想史」，筆者認為，作者為廣大讀者帶來了一個與目前中國大陸幾乎所有的文革官方解說和文革史書解說大為不同而探索和挖掘文革思想史「礦脈」的一本「入門書」。的確，無論是在文革故鄉之內還是在文革故鄉之外，不僅關於文革歷史以及文革個案的歷史研究少得可憐（至少與文革十年的歷史及其意義和影響遠不相配），而且關於文革眾多思潮乃至文革諸多思想的邏輯研究（或曰理論研究）可謂鳳毛麟角。《足跡》在一定意義上填補了文革研究的一項空白，擴大了文革研究的一塊非常有價值的研究領域，並且在很大程度上為大力推進文革思想史研究作出了一個充實的準備。

## 二

然而，《足跡》一書也有不足之處。一方面，書中出現了幾個有些令人遺憾的史實錯誤。例如，在頁76和頁83上兩次提及毛澤東1968年7月底召見北京地區紅衛兵五大領袖，把時間誤寫成「7月27日」，實際是「7月28日」，因為，正是由於7月27日清華大學嚴重的武鬥流血事件，才直接導致了7月28日凌晨3點半許至早上8點半許的毛澤東這次「召見」。在頁113上提及「湖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曾思玉和武漢軍區司

《足跡》在一定意義上填補了文革研究的一項空白，擴大了文革研究的一塊非常有價值的研究領域，並且在很大程度上為大力推進文革思想史研究作出了充實的準備。

儘管《足跡》使用「思潮」一詞界定文革青年的心態及其活動非常準確，但是還應該進一步分析或解釋為甚麼文革青年的諸多見解或眾多觀點只停留在「思潮」的水平，而很難達到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形態。

令員劉豐……」，劉豐當時為「武漢軍區政委」，司令員為曾思玉所兼任。在頁316上提及「魏光齊」的名字應該為「魏光奇」，因為作者多處提及的這位當年文革下鄉知識青年而現今為大學教授的人都是用「魏光奇」為其名。在頁147上的一條介紹楊小凱簡歷的註釋(138)上，對楊小凱(又名楊曦光)在澳大利亞一大學的就職，不應寫成「高級講師和教授(Reader)」，而應該寫成「高級講師(Reader)和教授」。在頁561上把宋永毅、孫大進編著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錯寫成「宋永毅：《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

另一方面，通讀《足跡》一書後，筆者個人覺得有點「不過癮」，或者說是對《足跡》可能有所苛求，想在這裏向作者、進而向文革研究同仁請教。

一是儘管《足跡》使用「思潮」一詞界定文革青年的心態及其活動非常準確，但是還應該進一步分析或解釋為甚麼文革青年的諸多見解或眾多觀點只停留在「思潮」的水平，而很難達到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形態。「思潮」畢竟不同於「理論」。「思潮」主要是流行於一般民間的大眾日常生活的、非系統化的、非學說化的見解、經驗、感受和心理意識等等的總和，而「理論」則是人們對於問題或對象所具有的明確的、系統的、往往是學說化的反思和闡釋。不難看出，文革青年思潮由於其所受的文化背景和思想土壤的影響，沒有上升為一種對於文革的全面概括和系統把握的理論，而更多

地是對於文革歷史現象以及文革意識形態的來自青年心理層面的反映、積澱或凝結。

二是《足跡》似應進一步指出文革青年思潮與文革成年人(或曰中、老年人)思潮的關係或互動。雖然文革青年思潮在文革所有思潮當中最為鮮亮和最有代表性，但是，如果《足跡》能把上述這種關係或互動結合進來，加以展現，則肯定會顯得更加豐滿和厚實。顯然，對於文革的不滿、懷疑和批評在文革各個時期、各個階層中都有所表現。據知，陳毅元帥在文革伊始就曾斷言，文革這場運動所要打擊的人員不下於八十萬；另一位中共開國元勳也在文革伊始對身邊的子女說過，文革的「後遺症」，二十年無法解決。他們都清楚地看到，文革這場運動將比中共以往歷次運動都更加殘酷、更加慘重。若是《足跡》能把上自黨國元勳、下至平民百姓對於文革的不同反應給予文革青年思潮的作用和影響加以勾勒出來，那無疑是妙筆出彩，錦上添花。這裏，一個具體的問題就是：為甚麼在所有的文革青年思潮中，沒有一個思潮達到了像顧準先生那樣的批判高度呢？

三是作者在展示文革青年思潮時，比較好地從現實的橫向上引入蘇聯、南斯拉夫以及歐美等國的有關理論或思潮加以對比，並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加以映襯，但是筆者認為，還應該在歷史的縱向上簡潔地比較一下文革青年思潮在整個中國二十世紀思想史以及社會思潮史的地位及其意義，即通過對比

1919年前後的新文化運動、1945年後的青年學生民主運動、1957年所謂「反右」等運動中具有的那些反專制、求啟蒙、要民主、爭人權的實踐及其思潮，進而更加豐滿地映現出文革青年思潮的不同或非凡、不足或缺陷。在筆者看來，除了文革伊始的老紅衛兵思潮之外，文革大多數青年思潮同上述的實踐及其思潮有着驚人的相似和重複，甚至更令人感慨、感嘆的是，諸多文革青年思潮延續的是自1919年以來為中國啟蒙、民主、人權和自由而奮鬥的事業所固有的同樣的話題、同樣的追求，乃至同樣的窘境。

四是文革青年思潮的一個獨特的窘境，在筆者看來，是它大致上經歷了一個由「意識形態化」到「泛意識形態化」再到「非意識形態化」最後到「反意識形態化」的過程。文革所有青年思潮的一個共同思想資源不是別的，恰恰就是文革前夕和文革之際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理論為主導的意識形態以及他的文革主張。今天看來，絕大多數的文革青年思潮當年所面臨的尷尬之處在於：它們當初所擁戴的或者所使用的，是同一位文革最高領袖樹起的同一面文革意識形態大纛。相比較於蘇聯和東歐國家當年持不同政見者們，文革青年思潮的精神資源相當貧瘠和匱乏，因而，這也就不難理解為甚麼文革青年思潮中屬於「極左的」（在筆者看來是「準意識形態」的或「泛意識形態」的）思潮居多。

然而，這些青年思潮所難能可貴的是把文革意識形態加以離析、拆解和不同的利用，特別是積極而又充分利用了文革意識形態乃至文

革大局固有的破綻和弊端，在造成了這種意識形態泛化的同時，也使得這種意識形態面目全非、支離破碎。當文革泛意識形態化的東西日益疏遠和背離文革的生活現實之時，諸多文革青年思潮的特有貢獻就在於把文革意識形態、泛意識形態的東西轉向對於文革懷疑、批判直至否定的非意識形態和反意識形態的境地。如果說文革是一個不斷異化而走向破產的過程，那麼文革青年思潮則經歷了一個不斷自我異化而走向自新的過程。

五是《足跡》對於文革青年思潮與中國大陸最近三十年來（名曰「改革開放」）思想發展史的關係的揭示，不僅應該有所強調，而且還有待深化。這主要是因為許多文革青年思潮不僅在今天的某些青年人看來有點簡單，並且已成為今天的眾多人們為之奮鬥或身體力行的常識，儘管文革當年為了這些思潮的形成、言說、論證和傳播，一些思想先驅者們（確切地說是「思潮先驅者們」）付出了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但是這種犧牲是否迎來了實現這些先驅者們的崇高理想？因此，《足跡》應該進一步指出諸多文革青年思潮所擁有的美好理想和偉大目標，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是否還依然有待努力奮鬥而加以實現。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文革青年思潮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遠沒有過時！誠如作者所言：「世界愈是黑暗，這一點星火愈是可貴」（頁155-56）！

唐少杰 北京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絕大多數的文革青年思潮當年所面臨的尷尬之處在於：它們當初所擁戴的或者所使用的，是同一位文革最高領袖樹起的同一面文革意識形態大纛，文革青年思潮的精神資源相當貧瘠和匱乏。